



朱 徽 著

中英诗艺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r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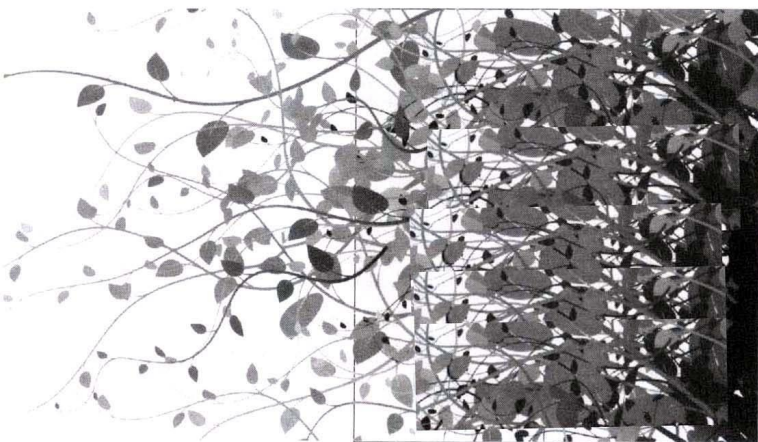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中英诗艺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r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



朱 徽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特约编辑:骆双丽
责任编辑:张 晶
责任校对:敬铃凌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英诗艺比较研究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r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 / 朱徽著. — 成
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8

(文学视阈)

ISBN 978-7-5614-4891-5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诗歌—比较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207.22②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5789 号

书名 中英诗艺比较研究
Zhong-Ying Shiyi Bijiao Yanjiu

著	者	朱 徽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891-5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7.75
字	数	46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3 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李赋宁

我和《中英比较诗艺》^①的作者朱徽同志相识已有 15 年了。1980 年年底，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会长冯至先生让我在会上作了《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报告。当时，四川大学外文系的领导委托青年教师朱徽同志到会上来约我的已故好友杨周翰教授和我前往川大讲演。蒙朱徽同志陪伴我们游览了望江楼公园，欣赏了锦江翠竹碧水的秀美。1981 年春末夏初，我去广州白云山广州外国语学院参加“应用语言学”学术会议。我在会上作了《英语的结构》的报告。与会者尚有陈嘉先生、戴镛龄先生和已故好友许国璋教授等。我有幸在会上遇到学界前辈谢文炳先生。当时，谢先生年事已高，但仍矫健，喜散步和爬山。朱徽同志陪谢先生一同来开会，与我们朝夕相处，畅谈甚欢。朱徽同志给我留下了聪慧、刚毅、谦虚、诚恳的一位青年学人的印象。1982 年，朱徽同志来北大参加美国富布赖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研修班，同时还参加了由杨周翰教授主持的比较文学研讨班（由哈佛大学纪延教授主讲）。我当时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职务，由于事杂，未能多关心这个班，但像朱徽同志这样年轻好学的教师来参加我系办的学习班，我感

① 编者按：本书修订后更名为《中英诗艺比较研究》。



到十分高兴，因为我们的外语教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果不出我所料，朱徽同志后来曾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进修比较文学和加拿大文学，又曾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及比较文学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1991年，他曾去日本，出席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三届大会，宣读论文《中英诗歌“意象”的比较研究》。他为该协会第十四届大会提交的论文是《中英诗歌比较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1996年，他将由香港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赴美国进行“美国诗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

十多年来，朱徽同志致力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诗歌在艺术特色和语言方面的比较研究，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硕果累累，令人赞赏。最近一年，他对已做过的工作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拟汇集成一本专著《中英比较诗艺》。

这本《中英比较诗艺》企图用现代西方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理论作为指导，对中英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语言特点进行较为系统、科学的比较研究。中英两个民族各自创作了无数篇光辉灿烂的诗歌作品，内容极为丰富、深刻，形式又是千变万化、美不胜收。这两个民族都有各自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它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在各时期的大诗人手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增强，因而在世界文学的领域内，中国诗歌和英国诗歌都占有领先的地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爱好和推崇。在诗歌理论方面，中英两个民族也都各自有辉煌的成就，留下了宝贵的诗论遗产，供后人借鉴和发扬。前人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高超的言论，但多半限于描述个人对诗歌作品的感受和印象。真正使诗歌理论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的却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的重大贡献。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首先区分“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语言符号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



(signifié) 等基本概念和术语。理查兹把语言区分为“指涉的”(referential) 和“非指涉的”(non-referential) 两个大类,前者指传达真实信息的科学性语言,后者指不真实的情感性语言,是一种“伪陈述”(pseudo-statement),也就是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使用的语言。理查兹在剑桥大学指导过的学生燕卜逊(William Empson, 1906 ~ 1984)着重研究诗歌语言的复义(ambiguity),影响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理查兹和燕卜逊这两位英国学者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20年代,理查兹在剑桥大学教书时就结识了中国留学生初大告先生,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后来出版了《孟子论心灵》(*Mencius on the Mind*, 1932)一书,说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视。燕卜逊曾两度在中国的大学教书,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新诗人(如穆旦)、翻译家(如杨周翰)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如王佐良)。我有幸也上过燕卜逊的课,共三门:莎士比亚(1937 ~ 1938)、三年级英语(1937 ~ 1938)和当代英国诗歌(1938 ~ 1939)。1978年,我去英国考察英语教学时,曾往伦敦燕先生寓所探望这位须发皆白的恩师。1979年,当我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时,我曾接待过理查兹先生和夫人(两人皆86岁高龄)来我系讲学。那是理查兹先生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回英国后不久就去世了。

朱徽同志的书中还提到韦勒克(R. Wellek)、奥·沃伦(A. Warren)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罗·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的《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当这两部书出版时,我有幸正在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修。我上过韦勒克的文学研究课(Literary Scholarship)和布鲁克斯讲授的20世纪文学课(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我也是这两部名著较早的读者之一。80年代初,我重访耶鲁大学时,拜访了这两位暮年的大师。他们都表示愿来中国作短期访问和讲学,终因年事已高未能成行,殊属



憾事。

我为朱徽同志的这本学术著作写序时，不仅回忆起不少往事和已故的师长和同学，还说了一些离题的话。我的心情一半是惆怅，一半是喜悦，因为老一代的学者已经停止工作，但是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新秀辈出，满园春色。我相信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必将在 21 世纪挺立于世界先进的学术研究之林。

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李赋宁 / i

绪 论 现代批评理论与中英诗艺比较研究 / 1

上编 诗艺与诗语

第一章	意 象	/ 9
第二章	语 法	/ 30
第三章	格 律	/ 60
第四章	修 辞	/ 94
第五章	描 摹	/ 119
第六章	通 感	/ 137
第七章	象 征	/ 148
第八章	张 力	/ 160
第九章	复 义	/ 174
第十章	意识流	/ 187
第十一章	用 典	/ 199
第十二章	悖 论	/ 218
第十三章	想 象	/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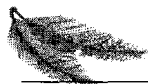
- 第十四章 移情 / 247
第十五章 变异与突出 / 256
第十六章 汉诗英译的语法问题 / 273
第十七章 中英十四行诗 / 285

下编 诗人与诗作

- 第十八章 《圣经·雅歌》与《诗经·国风》爱情篇章的艺术特色 / 305
第十九章 汉乐府民歌与英国民谣 / 320
第二十章 李贺与济慈诗歌的艺术特色 / 342
第二十一章 李清照与布朗宁夫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353
第二十二章 苏曼殊与英语诗歌 / 366
第二十三章 庞德与中国古诗 / 381
第二十四章 20 世纪初叶英诗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 395
第二十五章 五四时期中国新诗接受的英美影响 / 411
第二十六章 互涉文本：美国现代诗中的中国古诗 / 451
第二十七章 T. S. 艾略特与中国 / 463
第二十八章 艾米·洛威尔——中美文学交流的先驱 / 491
第二十九章 美国后现代诗歌与中国古诗 / 506
第三十章 中美女性自白诗歌 / 527

主要参考文献 / 555

后记 / 559



绪论

现代批评理论与 中英诗艺比较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诗经》《离骚》以降，历代名家辈出，佳作无以数计。仅以古典诗词而言，中国亦无愧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在英美诗歌的发展中，也出现过许多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诗人和优秀诗作。到了现代，两种诗歌开始交流和相互影响，英美意象派推崇并师法李白、王维等，中国新诗的主将们翻译、学习拜伦、雪莱、济慈等，推动着新诗的发展与繁荣。当代中英诗歌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更加频繁，新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水平。

汉语和英语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具有各自的特征，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诗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体裁而言，英美诗歌是叙事与抒情并重，而中国诗主要是抒情；就风格情致而言，英美诗以直率、深刻和铺陈胜，而中国诗以委婉、微妙和简隽胜；就审美特征而言，英美诗主要是阳刚之美，而中国诗主要是阴柔之美；等等。但是，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人类共有的精神产品。诗歌又是语言最精粹凝练、艺术技巧最丰富多样的一种文学形式。中英诗歌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意



象、格律、比喻、象征、张力、复义、通感、用典、意识流、结构与形式、变异与突出、修辞手法、移情等等。对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中英诗歌，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特色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之处，寻求“契合”（affinity），就成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工作者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理论上，比较文学领域内勃兴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派为这一类跨越时代和民族界限的“平行研究”开拓了道路，提供了依据。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有灿烂悠久的历史，仅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即可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媲美。唐代《文镜秘府论》所涉及的内容就包括诗格、诗式、声律和节奏等属于语言形式的成分。但是，中国的传统诗论主要是“印象式批评”（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将诗歌的风格和特点分成“雄浑、冲淡、典雅、绮丽”等二十四类；又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侧重在论者对作品的主观感受，虽精辟独到，不乏真知灼见，却往往缺乏细致严谨的科学分析，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诗论的一个缺陷。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韦勒克和奥·沃伦的《文学理论》和T. S. 艾略特的诗学论述等经典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理查兹将语言分成“指涉的”（referential）和“非指涉的”（non-referential）两个大类，前者指传达真实信息的科学性语言，后者指不真实的情感性语言，是一种“伪陈述”，普遍存在于以诗歌语言为代表的文学语言中。T. S. 艾略特大力提倡创作和批评中的“非个性化”（impersonality）、“与情感分离”（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和“客观关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主张“作品本身就是目的”。英美“新批评”对文学作品提倡“细读”（close reading），强调对作品进行“内在研究”（intrinsic study），即对文学作品的文本（text）本身（如意象、隐喻、格律和节奏等）进行精细的分析与研究，并为之提



出了一套方法和与之相应的术语。如：张力（tension）、复义（ambiguity）、反讽（irony）、悖论（paradox）和肌质（texture）等。依照这种理论和方法，诗歌的研究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布鲁克斯和罗·潘·沃伦的《理解诗歌》和燕卜逊的《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等重要著作就体现了这方面的成就。此外，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如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等的著作也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他们提出的“陌生化”（estrangement）理论和“语言的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 of language）等就是对语言学诗学研究的很大贡献。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提出，文学语言是对语言常规（norm）的一种变异（deviation），诗歌语言中的“消形”（deformation）现象就是“变异”的常见例子，而“变异”的目的是产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突出”（foregrounding）。此外，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文艺文体学（literary stylistics）以及现代语言学（modern linguistics）等理论也对研究诗歌的结构、形式和语言特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用现代批评理论作为指导，可以对中英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语言特点进行较为系统、科学的比较研究（本书中涉及中国诗歌的内容，是广义上的“诗歌”，与“韵文”相近，即除以中国古诗为主之外，还有词、曲，以及少量新诗）。例如，对诗歌语言的“复义”问题，英国文论家燕卜逊曾做过精细的研究，并从英诗名篇中选取了大量的实例说明：复义是“诗歌的强有力的表现手段之一”（《复义七型》），这与一千两百多年前刘勰的论述“隐以复义为工”，“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文心雕龙·隐秀》）等精辟论述如出一辙。而中国古诗中一些优美感人却难以分析的名句，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等，如果从“复义”的角度去观察，则可以归于燕卜逊分析过的七类复义中的“语法复义”（grammatical



ambiguity) 的典型。又如“意象”，中西理论家都对意象在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重要意义提出过相似的见解，如认为这是主观的“意”（情思）和客观的“象”（景物）的有机融合。应当说，T. S. 艾略特提倡的“客观关联物”就包括了意象。作为意象的组合方式之一，将比喻性意象和被比拟的意象直接连接，中间省去联系词语，即“意象叠加”，英美意象派诗人尤好使用。其主帅庞德（Ezra Pound）将这种手法赞之为“意象主义之真谛”，还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superposition”。他用这种手法写成了久负盛名的代表作《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the wet, black bough.

人群中千张面孔的魅影涌出；

湿漉漉的黑色树枝许多花瓣。

其实，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这种手法和意象并不新奇，如“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就比庞德的名句要早一千多年。再如，头韵（alliteration）是英语诗中一种很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中国古诗中的“双声”，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桂苒星霜换，回环节候催”（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等艺术手法与之相似。对中国古诗和英美诗歌，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特点方面作比较研究的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此外，在影响研究方面，对中英诗歌艺术，也需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如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英美诗坛上，以庞德和洛威尔（Amy Lowell）等诗人为首的“意象派”开了英美现代诗歌的先河，而精练含蓄的中国古诗就对他们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现代著名



诗人斯奈德、勃莱、凯泽、赖特和雷克斯罗斯等人的诗作和诗论明显接受了来自中国古诗的影响。另一方面，英美著名诗人（主要是浪漫派诗人）雪莱、济慈、拜伦、哈代、丁尼生、朗费罗、惠特曼和米莱等都对五四运动以来的许多诗人，在艺术思想和艺术手法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和郭沫若等，他们在自己深厚的国学根底的基础上接受了这些影响，在中国新诗史上写下了光辉永存的篇章。当代中国新诗中的优秀者更是广泛接受包括英美诗歌在内的外国文学艺术的影响。

比较不是目的。在现代批评理论指导下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把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诗歌放在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对照中进行观察分析，探索艺术技巧在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共同点，即契合之处。这样，处于当今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时代，我们就可以从英美诗歌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供我国的诗歌创作和评论作借鉴参考；同时，又力图在一个新的层次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中华民族灿烂瑰丽、历史悠久的古典诗歌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价值和地位；并为进一步探索中西之间跨时代、跨语种、跨民族的“共同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打下基础。

上
编

诗艺与诗语



